



红军干部团——长征中的“流动学校”
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，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。出发前夕，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，中革军委决定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编出的红军大学、红军第一步兵学校、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合并，组成干部团，并恢复工农红军学校建制。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，宋任穷任政治委员。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、具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。干部团辖3个步兵营、1个特科营、1个上级干部队，共1400余人。

长征开始后，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、掩护任务，随时参加战斗。不仅如此，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，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、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。干部团多是精兵强将且装备优良，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和缴获的钢盔。行军时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同志，经常出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。

钱锋 沈思

遇河架桥，争当开路先锋

长征出发伊始，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就受领在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的任务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，使红军4路纵队稳步从桥上通过。11月27日，特科营接到干部团急令：在湘江界首渡口架设一座浮桥。特科营工兵连一路急行军，越过崇山峻岭，克服千难万苦抵达界首，苦战一夜，最终按时完成任务。这座浮桥经受住敌机轮番轰炸，保障红军西进，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。

12月下旬，中央红军进至贵州省黄平、余庆、瓮安地区，被乌江挡住去路。1935年元旦，在对岸有敌军防守、后有敌军紧追不舍的紧迫形势下，中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下达架设乌江桥的任务。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接领任务后，立即率领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。工兵连官兵将由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。由于水深流急，河底石头大而光滑，桥桩难以固定，立刻就被狂涛骇浪卷走，几次架桥都失败了。陈赓紧急召开“诸葛亮会”，发动大家开动脑筋，但几次现场模拟还是不可

行。一筹莫展之际，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何涤宙想出一个办法：在竹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，竹篓内装入石头，两个竹篓上下扣住，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，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，以此代锚，固定浮桥。经过36个小时的艰苦奋斗，工兵连终于将浮桥架到江对岸，确保军委纵队和各军团渡过乌江，直下遵义。

英勇作战，立下赫赫战功

在遵义会议上恢复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，随即指挥四渡赤水。其间，干部团配合主力部队参与两场战斗，一是渡赤水前攻打土城，二是二渡赤水后再克遵义。

1935年1月28日，中央红军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，在土城枫树坝、青杠坡突遇敌军，红三、红五军团率先投入战斗。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，红军陷入困境，毛泽东急令干部团前往支援。陈赓率干部团英勇反击，有力打击了敌人。土城战斗后的第二天，干部团又配合主力部队投入一渡赤水的战斗并重创了敌人。

2月中下旬，红军二渡赤水，准备拿下娄山关，再占遵义。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，令干部团急行军一天走120余里，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扼守娄山关，其余赶赴遵义城外夺取老鸦山。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，谁能控制它，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。经过苦战，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第10团胜利攻占老鸦山，使红军再夺遵义城。此役，红军共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，俘虏敌人3000余人，缴获大批武器、弹药和物资，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，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，极大振奋了全军士气。

四渡赤水后，红军进军云南，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。5月2日，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赶在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。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，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。干部团以第三营为先遣营，以两个步兵营、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为后梯队。为出其不意，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，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，伪装成国民党部队，翻山越岭，一昼夜急行160余里，迅速占领皎平渡南岸，悄悄渡过江抢占北岸制高点，俘虏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，并控制渡口。而后，干部团乘胜攻占通安州，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以7只小木船全部渡过金沙江，跳出

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，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，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为此，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。

边战边学，提高战术水平

长征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，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干部的流动学校，始终坚持且走且教、边战边学。干部团一日行军百里，跋山涉水，不忘教学本职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，充分利用宿营、休息、站岗及战斗间隙，采取集体教学、个别辅导、三五成群讨论相结合的方式，学习战术技术、研究战例、总结战斗经验，先后组织遭遇战、伏击战、强渡江河、穿插、迂回、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。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，组织学员进行讨论。学员在热烈的



讨论中交流了思想，增长了知识，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，驱散了行军的疲劳。

1935年9月中下旬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，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干部团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。11月，陕甘支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，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会合，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。至此，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。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精锐部队，它留下的赫赫战绩，永远是长征这一宏大叙事史诗中的精彩篇章。

据《中国国防报》

傅斯年为北大“清理门户”

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。日本侵略者为奴化中国青年，北京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曾于1939年1月组建“伪北大”，1月14日，所谓国立“北京大学”补行“成立典礼”。以汤尔和为总监督，后改设校长，钱稻荪为伪北大第一任校长。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，兼图书馆馆长等职。这所拼凑起来的“北京大学”，一度成为日伪奴化教育控制思想的一颗棋子。



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，北大等各校返回北平复校。稍早一些，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应邀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，蒋介石有意安排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，但被其婉拒，并力荐自己的老师胡适出任校长。但因胡适尚在美国，暂不能到任，便决定由傅斯年代理校长。

傅斯年虽为代理校长，实为整个过渡时期里的实际负责人和执行者。他在1947年1月7日致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说：“大批伪教职工进来。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，但我决心扫荡之，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。”

当年10月和12月，傅斯年两次在重庆声明，表示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：“专科以上学校，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，做一个榜样，给学生们下一代看。”

1945年11月，傅斯年抵达北平。在他之前返校、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伪北大学生学习班的陈雪屏教授前往接机。见面的第一句话，傅斯年就问陈雪屏与伪北大教员有无来往，并愤然道：“汉贼不两立，连握手都不应该。”11月28日，《大公报》报道了傅斯年的强硬态度：“伪校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，应属附逆之列，将来不可担任教职。”

伪北大教职员听说代理校长一律开除他们，便四处游说、请人说情，包括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、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愿。据袁一丹在《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》中考证，1945年10月26日，朱家骅就收到周作人来信，抱怨傅“学校停闭，学生重行甄别分发，稍涉苛细”，希望“如能赐予救济，万众感戴”等。

北平的《世界日报》1945年12月8日刊发评论，认为傅斯年“对伪北大教职员，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、不共戴天的愤

怒”。傅斯年则正气凛然告诉该报记者：“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，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，辨忠奸。”“无论现在将来，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。”“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！”

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周作人，傅斯年同样毫不留情。周作人对傅斯年开除他一事耿耿于怀，多次撰文赋诗辱骂。

据称，傅斯年不仅开除伪北大教授，且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。伪北大校长鲍篆清附敌有据，河北高等法院却宣判他无罪。傅先生搜集鲍氏四项罪状，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，“最终将其绳之以法”。同样表明了傅代校长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，无畏立场，“一个也不饶恕！”

当然，傅斯年之所以对伪教授如此强硬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即蒋梦麟、胡适、北大教授团体及淪昆同学会一致支持他强硬，使他硬得有底气、有靠山。况且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，北大若留用伪教授，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：“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。”（1945年12月8日北平《世界日报》）

结果，周作人即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最初判处14年有期徒刑，后经减刑改为10年，在南京老虎桥监狱（即提篮桥监狱）服刑，1949年1月26日获准保释，实际服刑时间约为4年。

对于伪北大的青年学生，傅斯年则网开一面：“青年何辜，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，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，我是主张善为待之，予以就学便利。”除陈雪屏代表教育部原在北平设立临时大学进行收容外，傅斯年又派郑天挺代表北大筹备复原，对伪北大学生给予了妥善安置。

刘效仁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